

重负



纠正

——谢默斯·希尼诗歌与
当代北爱尔兰社会文化矛盾

欧
震
✿
著



重负



纠正

——谢默斯·希尼诗歌与
当代北爱尔兰社会文化矛盾

欧
震
✻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重负与纠正——谢默斯·希尼诗歌与当代北爱尔兰
社会文化矛盾/欧震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1. 7

ISBN 978-7-5004-9818-6

I: ①重… II. ①欧… III. ①希尼, S. —诗歌研究
IV. ①I562.0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84910 号

责任编辑 罗 莉
责任校对 石春梅
封面设计 大鹏设计
技术编辑 李 建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 (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1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6.25

插 页 2

字 数 256 千字

定 价 34.00 元

目 录

绪论 起点	(1)
第一章 跨越身份的边界	(14)
第二章 被想象的地方	(71)
第三章 测听语言	(123)
第四章 暴力的考古学	(173)
结论	(228)
参考文献	(239)
附录一 希尼年表	(246)
附录二 希尼作品目录	(252)
附录三 希尼研究专著	(255)

绪 论

起 点

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后，北爱尔兰出现了一个优秀的诗歌创作群体。这个诗歌创作群体的主要代表谢默斯·希尼（Seamus Heaney）、迈克尔·朗莱（Michael Langley）、汤姆·鲍林（Tom Paulin）、保罗·穆尔敦（Paul Muldoon）等人，今天已经成为当代英语诗歌谱系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体现了英语诗歌感性的最新发展。而谢默斯·希尼无疑是这个诗歌群体中最具有象征意义的人物。早在 1975 年，美国诗人罗伯特·洛厄尔（Robert Lowell）就以预言家的口吻把希尼称着“自叶芝以来最伟大的爱尔兰诗人”^①。如果说洛厄尔的这一评价在当时看来还有点夸大其辞的话，那么希尼以他不断涌现的充满感性和洞察力的创作使其成为一个不需要争论的事实。今天，人们已经普遍认为希尼是英语世界中仍然健在的最伟大的诗人。他那感性、朴实又富于张力和深度的诗歌，同时俘获了专家和普通读者的心，在一个诗歌被忽视的时代为诗歌赢得了尊严。他的创作为英语诗歌传统的延续和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增进了英语的感性力量和表意深度。他的贡献让他非常自然地走到了诺贝尔文学奖的领奖台，接受瑞典文学院对他诗歌“洋溢着抒情之美，包含着深邃的伦理，揭示出日常生活和现实历史的奇迹”^②的褒奖。另一位伟大的英语诗人 T. S. 艾略特（T. S. Eliot）曾经对一个民族的诗歌和感性的更新下过这样的断言：“一个停止创造新的诗歌的民

① 转引自 Elmer Andrews ed., *The Poetry of Seamus Heane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7.

② 转引自 Jeffrey W. Hunter ed., *Contemporary Literary Criticism*, vol. 225, Detroit: Gale Group, 2006, p. 90.

族，对其过去传统创造的伟大诗歌的欣赏和理解，也必将陷于长期的停滞之中”^①，这个断言同样可以用作希尼适合于阅读和研究的证明。因为按照艾略特的逻辑，对希尼诗歌的阅读和研究不仅仅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英语诗歌感性的当代水准，也是将英语伟大的诗歌传统的潜能从其惯性和常识中释放出来必不可少的条件。作为一个外国文学的读者和研究者，很难回避希尼这样一个当代英语诗歌的代表人物的存在。

更应该强调的是，希尼诗歌的成就是在一个根本上缺乏诗意的历史语境中取得的。作为一个生活在20世纪后半叶的北爱尔兰的诗人，希尼承受着比其他地区、其他时代的诗人更严酷的生存考验和美学拷问。北爱尔兰，这块世界地图上“巴掌般大小的地方”，却极不相称地承载着人类存在的几乎所有悖论：作为一个地理空间，它被两个互相冲突的主权声明分裂着；作为一个政治单元，它被两种互不妥协的忠诚撕扯着；作为一个信仰场所，它被同一个上帝的两个各不相让的变体眷顾着；作为一个历史的载体，它被宗主国和本土的不同的遗产挤压着；作为一个经济实体，它被工业和农业景象的戏剧性反差消耗着；作为一个生存的地方，它被种族的对立败坏着；作为一个语言系统，它被两种各自为阵的言语僭越着……这些人类存在的悖论“像超载的干草”，让北爱尔兰这片“小小的草地不堪负荷”。^②在希尼现实人生和诗歌人生的最关键的时期，这些“超载的负荷”以悲剧性的方式在这片“小小的草地”倾覆了；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北爱尔兰陷入了旷日持久的集体暴力冲突，冲突一直延续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北爱尔兰几乎变成了人类苦难的一个标本。希尼和他同时代的北爱尔兰人的生命仿佛被投进了“一个可怕的黑洞”^③，肉体和日常生活的存续都成了一个难以应付的问题。在这样的历史情境中，诗歌何以可能？诗人能够何为？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和阿多诺（Theodore Adorno）提出的两个问题，以如此尖锐的现实性扎入了这一代北爱尔兰诗人的意识中。面对生命

① T. S. Eliot, 'Lecture on Anniversaries of Faber & Faber on April 10, 1956', in the advertisement paper of Seamus Heaney's *North*, London: Faber & Faber, 1975.

② Seamus Heaney, 'The Other Side', in *Opened Ground: Poems 1966-1966*, London: Faber & Faber, 1998, p. 60.

③ Seamus Heaney, 'Cessation 1994', in *Finders Keepers: Selected Prose 1971-2001*, London: Faber & Faber, 2003, p. 45.

的无谓消耗，诗歌如何抚平创伤？面对心灵的偏狭和荒凉，诗歌何以启迪和滋润？面对咄咄逼人的暴力，诗人靠什么去化解？面对种族忠诚的邀约，诗人该如何去承担？自诗歌诞生以来，对这种想象性的语言形式的从未中断过的意义追问累积在一起，通过历史的这个“可怕的黑洞”，倾泻在包括希尼在内的北爱尔兰诗人身上。他们必须同时去承受和调和一个脆弱的个体生命、一个负责任的公民和一个自我愉悦的诗人这三种角色在一个明显违背人的天性的处境中经常是互相冲突的要求，必须为他们的个体生命寻庇护，为他们的公民责任作承担，为他们的诗歌写作找理由。而他们抗过了这些严酷的生存考验和尖锐的美学拷问，仍然在写诗这一事实，本身就是让人震惊的。更何况他们的写诗，决不是泛泛的写作姿态而已，而是取得了对文学感性和人类文明有着建设性作用的，已被广泛认可的现实成就。

在希尼这一代北爱尔兰诗人身上，体现了一个经常困扰我们的关于诗歌和历史的奇怪悖论：最缺乏诗意的历史语境何以会同这个时代最好的诗歌发生关系？或者说，为什么诗歌居然会在按照常识的理解最难以存活的土壤中开花结果？如同希尼在《格劳伯男人》（*The Grauballe Man*）的结尾追问的：

他被吊在天平上
一边是美一边是暴行：
一边是垂死的高卢人
过于精密的罗盘

镶嵌在他的盾牌上，
一边是有实际重量的
被蒙上头的受害人
被砍死后抛入泥炭田。^①

（吴德安译）^②

① Seamus Heaney, 'The Grauballe Man', in *Opened Ground: Poems 1966 - 1996*, Ibid., p. 116.

② 本书中译文如未注明译者，均为笔者翻译。所引译文主要参照吴德安编译《希尼诗文集》，作家出版社2001年版。根据原文，笔者对所引译文有所调整。

一边是人类最伟大的创造，这些创造赋予人以人性，以一种想象性的同情，把人从动物性的一己狭隘经验中提升起来；一边是文明最可怕的因袭，它使人类偏离了自然的属性，常常因为虚幻的观念，把自己置于有意识的集体仇恨和互相杀戮中。更关键的在于，这两种截然相反的人类文化特征，往往违背人的主观意愿被粗暴地并置在一起。20 世纪后半叶，被希尼称为“四分之一世纪的生命浪费和精神浪费”^①的集体暴力冲突和被批评家称为“贝尔法斯特文艺复兴”的诗歌繁荣，同时降临在被人类文明的悖论撕裂的北爱尔兰，把上面提到的并置戏剧性地呈现出来。我们这样说，并不是要暗示诗歌和文明最可怕的因袭存在某种隐秘的关联，——虽然希尼确实说过“诗歌的根和麻烦的根是相同的”^②，而是想说明诗歌还有人性，可以不被生命的不幸和历史的灾难所扭曲，在人类所能够想象的最恶劣的生态中，体现出人性和文明依然值得我们守护和寄托的积极价值。

从这个角度再回过头去考察，洛厄尔将希尼与叶芝相提并论的评价，就与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指责的诗人感性冲动的随心所欲扯不上关系，而是一种具有惊人敏感性和预见力的洞察。希尼与叶芝被洛厄尔联系起来，并不是因为他们“共同分享了爱尔兰性这一抽象的事实”，^③而是因为他们诗歌的成就概括了现代爱尔兰诗歌的一个鲜明特征：“用诗歌的农艺/把诅咒变成葡萄园”^④。他们同样见证了现代爱尔兰历史上两段最痛苦的经历，同样承受着历史悲剧对个人生存和诗性表达的追问，同样幸运而自豪地参与了现代爱尔兰文学的两次复兴，而且同样地在几乎完全相同的时机——叶芝于 1923 爱尔兰自由联邦宣布脱离英国独立后一年，希尼于 1995 年北爱尔兰共和军宣布

① Seamus Heaney, 'Crediting Poetry: The Nobel Lecture, 1995', in *Opened Ground: Poems 1966-1996*, Ibid., p. 455.

② Elmer Andrews, *The Poetry of Seamus Heaney: All the Realms of Whisper*, New York: St. Martin Press, 1988, p. 17.

③ Terry Eagleton, 'Review of *Field Work*', in *Seamus Heaney*, Michael Allen ed., New York: St. Martin Press, 1997, p. 102.

④ W. H. Auden, 'In Memory of W. B. Yeats', in *The Collected Poems*, New York: Modern Library, 2007, p. 247.

无限期停火、北爱和平进程重新启动的第二年——被瑞典文学院授予了诺贝尔文学奖的荣誉。我们不清楚这是出于一种刻意的安排，还是一种天才的“感性冲动”的巧合，但它说明了一点，对叶芝和希尼的诗歌成就考察，只能与他们诗歌得以涌现的那个缺乏诗意的历史语境联系在一起，才可能得出接近正确的结论。而且，只要我们稍稍将叶芝和希尼的诗歌命运推而广之，就会在人类的诗歌史上找到太多近似的范例。在屈原和楚国的危难之间，在但丁（Dante Aligheri）和中世纪后期佛罗伦萨的动荡之间，在艾略特和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文化荒原之间，在曼德尔施塔姆（Osip Mandelstam）和他的国家的政治恐怖之间，我们都可以找到把历史的诅咒变成诗歌的葡萄园的范例。似乎诗歌的缪斯特别钟情于人类的苦难，在人类存在的悖论愈尖锐愈难以解决的地方，诗性表达的冲动也就愈发的强烈，诗歌也被愈发急迫地要求出场。面对这个现象，海德格尔和阿多诺的问题应该换一个提法：不是诗歌何以可能，诗人能够何为，而是诗歌何以发生，诗人如何使这一不可避免的发生成为可能。

我们在这里并非为了空泛地讨论这个文学史上老生常谈的问题，而是为了考察这个似乎古老的问题与我们当下的生存现实和文学状况的关系。其实，我们都非常清楚，文学史上的新问题本质上都是源自那些似乎已经解决了的老问题。这些老问题，在崭新的历史语境和文化语境中，重新起获了紧迫性，重新从其他问题的背景转入自身便是问题的前景。希尼不是在一个像地理学上的北爱尔兰那样的脱离人类文化的孤岛上进行创作，他本身就是当代人类文化的产物。北爱尔兰的社会文化矛盾，也并非上帝对那片土地的专门诅咒。当代世界的几乎每一个角落，都以这种形式或那种形式、或多或少、或隐或显，承受着与北爱尔兰类似的人类文明的诅咒。在这一点上，没有人能够幸免。北爱尔兰不过是不幸地将人类文化共同的悖论，现实地、集中地暴露出来而已。从这个意义上讲，对北爱尔兰社会文化悖论的考察，就不只是外国文学研究的外部问题，而是一个理解我们自己的现实处境和文化状况的内部问题。实际上与北爱尔兰社会文化矛盾相似的一些社会问题和文化悖论，已经在我们当代社会生活中制造了潜伏性的紧张。对北爱尔兰历史悲剧的反思，也许不能帮助我们消除这种紧

张，但却能够为我们阻止这种潜伏性的紧张演变为现实性的冲突，提供因痛苦而获得的智慧。

此外，作为一名文学院系的教师，在当代中国的文化语境中，我越来越陷入对自己工作意义的困扰：那些包括希尼诗歌在内的代表了人类文明成就的文学经典，正在迅速地失去对我的学生的影响力。按照一些年轻的写作者的说法，文学和作家在今天都是“不太光彩的字眼”。作为一个读者，我没有太多的对文学的自负，也不希望文学拥有超越其他人类行为的“光彩”，只是希望文学不被视作对人类智慧的浪费，不被自己的学生看作一种他们的前辈迷恋的可笑的怪癖。至于文学的更多的意义，是每个读者进入文学的世界后自己收获的。而诗歌，这种所有文学形式中最难以提取现实意义的形式，面临的置疑尤其突出。诗歌在今天中国的这种处境，某种程度上与希尼面对的处境有着惊人的相似，它们面对的追问也几乎是完全一样的。对希尼提出的“面对暴力，诗歌有什么用”的问题，只需换一个宾语就成了我的学生对我提出的问题。这种状况甚至也反映在我的朋友和同事中间，应该说，他们的个人经验，有很大部分上是由文学经验塑造而成的。但当我的一位研究生期间的同学听说我选择希尼诗歌作为博士论文的选题的时候，他略带惊讶的反问让我更加迷惑：“你怎么还在关心诗歌啊？”也许他的反问是本能，也许是出于对我的诗歌选题可能冒的学术风险的担忧。因为，一个无法同现实问题嫁接的选题本身就是成问题的，他没有想到他的反问正好帮助我实现了这种嫁接。我选择希尼诗歌研究的另一个意义，一下子显豁了：对希尼诗歌的考察，一定程度上会反射回来，帮助我们厘清对诗歌对文学的困扰。在这个时候，我总会想起艾略特对诗歌的那个断言：“一个停止创造新的诗歌的民族，对其过去传统创造的伟大诗歌的欣赏和理解，也必将陷于长期的停滞之中”。

选择希尼诗歌作为我的研究对象，也有我个人还愿的考虑。我和希尼的关系首先是一个读者和他心爱的作家的关系。还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那时的我，还是一个身材瘦削、神情忧郁的年轻人，像那个年代的许多年轻人一样，过着一种纯粹意义的、有点堂·吉珂德式的精神生活，经常徜徉在诗歌的深井边，盼望从中倾听到被外部现实的喧嚣模糊

了的自我的声音。某个下午，我从刚到手的《世界文学》杂志上读到了袁可嘉先生翻译的几首最新的英语诗歌。这些诗歌与我当时迷恋的那些超现实主义或者象征主义的诗歌是如此不同，单纯、明晰、质朴却又不乏感性和丰富，与我想象中的那种技艺炫目的现代诗歌相比，更像是19世纪以前牢靠持重的手工活。我突然意识到，诗歌原来也可以不必都是神秘的象征和语言的奇遇，只需最原始的词汇便可捕获常被人忽略的日常生活。从那时起我记住了希尼。直到今天，还让我惊奇的是，我居然当时就在我念书的那所偏居北碚的学校的图书馆中找到希尼的一本英文诗集——他1979年出版的诗选集。借着词典，我一个字一个字地啃读着希尼。与其说那是在读诗，不如说是在搬运词语——把英汉词典中一个个词语的砖头挪动到希尼的诗句中，用我的笨拙的翻译手艺，把它们砌成糟糕的汉语。最终我没有读懂那些诗，但希尼诗歌的屋子中那些无法被拆开的词语的砖头，却零零星星的散落在我的意识深处，仿佛黑暗中的“垫脚石”。从这个意义上讲，希尼是进入了我的诗人。也许是因为这个原因，后来希尼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金，我一点都不觉得惊奇，倒觉得是一个老朋友漂泊多年回了家。从我研究生学习到后来在大学任教，我几乎是下意识地避免从学术上触碰希尼，因为这样的触碰仿佛是在敞开自己的私生活，总有点难为情。这么多年过去了，希尼一直在我意识中的某个位置——不一定总是处于意识的前景——他需要被说出，不是为了他而是为了我。而我也已经成熟到足以坦率地面对自己的所有经验。一切仿佛水到渠成了，像希尼诗歌中说的：她的开口处湿了，她来了。^①

因此，在本书中我尽量保持自己作为一个读者的姿态。当然不是那个个人经验与希尼诗歌纠缠在一起的读者，而是那个剥开了自己的个人经验直接面对希尼诗歌的读者，——虽然这两个读者总是令人困扰地无法完全分离。我以读者的身份进入希尼的诗歌，首先去呈现希尼诗歌在阅读中的形象，而不是他的诗歌言说了什么。这是因为：其一，我始终相信一个文学研究者他的理论言说的合法性，首先来源于他作为一个

^① [爱] 谢默斯·希尼：《水中女仙》，《二十世纪英语诗选》（中），傅浩编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393页。

“称职的读者”的“称职的阅读”。所谓“称职”，指的是他的阅读是深入到个人经验内部的，是同他的生存问题和精神问题息息相关的，即使他并不以阅读和讲述自己的阅读谋生，阅读依然是他个人经验中不可或缺的；同时，“称职”也意味着他不偏狭于自己的阅读经验，而总是将自己的阅读经验向文化传统、公共世界和其他读者敞开。在这种敞开中，他自己的经验和视野被拓展，而他生活的世界也因此而获益。这种阅读必然是持续的、不断更新的、严肃的、有标准的，并且肯定也是充满愉悦的。很难设想一个从未深刻地卷入阅读经验的人，一个仅仅以大学教职作为谋生手段的人，会传达出关于文学的可靠言说。其二，我担心，如果不从对希尼诗歌的阅读进入希尼诗歌的世界，会不会被太多拥挤在我们文学课堂里的理论轻易劫持，而把希尼的诗歌解释成为某种意识形态和观念体系的复杂的想象性的载体，或者把希尼的具体人生和独特创造抽象成为研究者心目中的某种文学的或者人生的普遍原型。而这正是希尼深恶痛绝的。某种程度上，希尼的人生和创作，都是在与那种将不可化约的个体生命和无法抽象的精神存在归结为某种普遍的预定本质的力量角力。他一直相信，诗歌同人的存在一样，首先是一个你必须无条件接受的事实，借用美国诗人阿契博尔德·麦克利什（Archibald MacLeish）的话说：“诗歌应该等于而不是忠实”。^①从阅读进入而不是从某个预设的理论进入，是将诗歌视做一个事实而不是证据的必然选择。我很清楚，这种方式要冒很大的风险，因为可能你从阅读进去之后出来的时候仍然一无所获，或者只是重申了现实和诗歌的复杂性和不可化约性的常识。但相对于看得见却不可靠的收获，我更愿意回到不需要你专门去看却可靠得多的常识。而希尼无疑是一个适合于阅读的作者，我和希尼的关系不过是他诗歌对读者影响的一个具体案例。

也许正是由于上面这些原因，我最终把自己对希尼诗歌的个人兴趣，从私生活的领域拉出来，放在学术研究的理性的光亮中。接下来是如何写的问题了。在这里，我遇到了整个写作过程中的最大障碍。因为一旦转入具体的写作，我发现结构成了一个大麻烦：希尼诗歌和北爱尔兰

^① Archibald MacLeish, 'Ars Poetica', in *The Treasury of American Poetry*, Nancy Sullivan ed., New York: Doubleday & Company, 1978, p. 471.

兰社会文化矛盾的关系，是一个太过复杂和宽泛的论题。如何去寻找一个既能有效概括北爱尔兰社会文化矛盾的特点，又能非常自然地与希尼诗歌本身的成就结合的框架非常重要。如果缺少了这样一个能够恰当地再现希尼诗歌和它们的历史语境内在关系的框架，研究很可能变成对北爱尔兰社会文化矛盾的空泛的分析和说明，而希尼的诗歌会被用来机械地图解和证明这种空泛的分析和说明。或者相反，如果太过具体陷入对希尼诗歌本身的分析和讨论，就无法展示这些诗歌呈现的艺术成果，何以是在北爱尔兰社会文化矛盾这一特定语境中达成的，而不仅仅是它们偶然地被一个生活在这里的诗人创作出来而已。要实现这一目标，很明显，分析只能从希尼的诗歌进去，然后再从其中穿出来，也就是说，必须在希尼的诗歌当中而不是在他诗歌的外面，去寻找一个使论题的两方面可以同时被激活的支点。这一工作消耗了我最多的时间和精力，呈现于本书中的结果也不一定是最令人满意的，但这是我自己能够找到的最佳的选择。这个选择来自对希尼的阅读，希尼在1980年出版的第一本散文集《全神贯注：1968—1978年散文选》（*Preoccupation: Selected Prose 1968—1978*）的前言中，谈到了他编选这个集子的动机：

我所有对艺术的认识都来自我写的诗歌，来自那些曾帮助我写下这些诗的诗人……但我希望这一点是清楚的：这里结集在一起的散文，都是在搜寻我聚精会神的一些中心问题的答案：一个诗人何以合适地生存和写作？他与自己的声音，与自己生活的地方，与他的文学遗产和他的当代世界的关系如何？^①

在这里我听出了海德格尔和阿多诺所提问题的声音，也听出了与我生活的时代相似的对诗歌意义的焦虑。希尼写诗，不仅仅是为了体验语言的和想象力的诗性活动带来的身心愉悦，——虽然这种愉悦是他进入诗歌并在诗歌中栖身的前提——而是为了解答自己作为一个诗人生存和写作的意义问题。这个诗人不是生活在一个封闭的象牙塔里诗意地静观，他

① Seamus Heaney, 'Preface', in *Preoccupation: Selected Prose 1968—1978*, New York: Noonday Press, 1980, p. 10. 着重号为笔者所加。

本身就是一个由具体的时空构成的真实世界的一员，他的诗意的写作与自己的生存有关，并通过这种个人化的生存同周围世界发生关系。读到这里，我一下子意识到，希尼的写作——不仅仅是散文写作（其实一个诗人放弃诗歌转而寻求散文表达，本身就说明这种表达是如此之关键），更包括他的诗歌写作——与北爱尔兰社会文化矛盾互相联系的通道开启了。所以当我在他 2002 年出版的散文选集《发现者·维护者：1971—2001 年散文选》（*Finders Keepers: Selected Prose 1971—2001*）的序言中再次读到这段文字的时候，我明白：本书的结构确定了。

但马上另一个问题又开始困扰我：一旦选定以希尼提出的诗人生存和写作的四个核心问题为框架，来分析希尼诗歌和北爱尔兰社会文化矛盾的关系，我就发现，这四个问题在真实的语境中其实是互相交叠的，很难真正从逻辑上分开。希尼与自己的声音的关系实际上是诗人的角色和身份问题，这个问题某种程度上涵盖了其他三个关系，构成在“黑暗的时代”中“诗人何以合适地生存和写作”这一问题的核心，也折射了希尼在诗歌中表现历史危机和人类灾难的自觉。论题内容的这种难以清晰地切割的特点，很可能导致逻辑上和形式上对论题的切割，从而削弱思考问题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或者相反，为了尽可能保留这种丰富性和复杂性，却造成逻辑上、形式上的相互纠缠。在本书的具体写作中，我只能在这种类似于黑格尔的理性悖论的两难中走钢丝，尽量避免思考问题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因形式上的要求被牺牲，同时也避免因为迁就这种事实本身的弹性而导致逻辑上的不统一。至于我努力的效果，只能等专家和读者去判断了。稍稍让我减轻忧虑的是，这个论题某种程度上是很难形成单一结论的，只要能展示论题牵涉问题的事实关系，揭示出即使在困难的时代诗歌也是有意义的，本书的基本目的就已经实现了。也许这也是我为绪论起名为“起点”的原因。我想表达，我这本书不过是对这一问题进行更深入探讨的起点。我想说的另一层意思是，其实人类的任何文化创造，都是一个朝向人类可能的未来的起点。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由于论题的限制，在书中我更多讨论的是希尼 20 世纪 90 年代以前的创作，更多着眼他在那“四分之一世纪的生命浪费和精神浪费”中的生活和思考。这种安排，一方面是因为这一时期的创作最能代表希尼迄今为止的艺术成就和艺术特色，以其为主要论据具

有典型性和代表性；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这一时期是北爱尔兰社会文化矛盾最为尖锐的时期，也是希尼人生和思想最富有张力的时期，以这个时期的创作来切入对希尼诗歌和北爱尔兰社会文化矛盾的思考，从内容上和逻辑上也是最恰当的。为了便于分析，我粗略地把希尼的创作发展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从他的第一部正式出版的诗集《一个自然主义者之死》（*Death of a Naturalist*, 1966）到诗集《外出越冬》（*Wintering Out*, 1972），这一时期，希尼的创作主要围绕个人经验和与此息息相关的北爱尔兰地理和历史记忆展开，其创作方向是回顾式的、向内的，他迫切希望借此确定自己个人的也是北爱尔兰的文化身份；第二个时期是从1975年出版的诗集《北方》（*North*）开始到1984年出版的诗集《苦路岛》（*Station Island*），希尼的注意力转向了北爱尔兰现实的社会文化矛盾，他更深地体察到北爱尔兰社会和文化多元混杂的特点，对自己作为一个爱尔兰人的文化涵义进行了深刻反思；第三个时期是从《苦路岛》到今天，伴随着希尼在更广阔的世界中频繁穿梭，他的文化意识更加开放，他对北爱尔兰问题的思索被置于整个人类前途和命运的大背景中，他也在更为动态的既尊重自己真实的经验又与周围世界融通的结构中寻求自我的位置，表现出更加成熟、宽容和更富有同情心的诗人的品格。我对希尼创作的这个分期方法与英美学术界对希尼创作发展的认知基本上是吻合的，与哈罗德·布卢姆（Harold Bloom）齐名的哈佛大学诗歌教授海伦·文德勒（Helen Vendler）和爱尔兰希尼研究专家《谢默斯·希尼和诗歌语言》（*Seamus Heaney and the Language of Poetry*, 1994）一书的作者贝尔纳·奥多诺古（Bernard O'Donoghue）都采用了这个分期方法。^①当然，希尼仍然处在创作的活跃阶段，对希尼诗歌的研究也在不断推进，我们完全可以期待能够更加准确概括希尼创作发展的分期方法的出现。

本书最后呈现为现在提供给专家和读者的形态：在一个简要阐释了我选题的目的和意义的绪论之后，围绕希尼“一个诗人何以合适地生存

① 参见 Helen Vendler, *Seamus Heaney*,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Bernard O'Donoghue, *Seamus Heaney and the Language of Poetry*, New York: Harvester Wheatsheaf, 1994.

和写作”这个问题的四个小问题展开了分析：论文的第一个部分《跨越身份的边界》，集中对希尼提出的“诗人与自己的声音”的关系问题展开分析。“诗人与自己的声音”的关系本质上是诗人与自我的关系，也即诗人的身份问题。作为一个生活在北爱尔兰这个历史和文化分裂语境中的诗人，身份问题对希尼来说有着突出的意义。某种程度上，这个问题具有统摄性的作用，后面的几个问题是对它的深化和扩展。通过对自己作为一个北爱尔兰诗人的身份的痛苦探寻和思索，希尼最终想找到一个既能忠实于每个人具体真实的经验又能开放性地包容他者的“不那么附有的义务”的社会政治空间，在那里身份不再是将人分隔开来的观念和体制障碍，而是不同的个体分享丰富的、差异性的人生经验的机会。第二个部分《被想象的地方》，梳理了希尼“诗人与自己生活的地方”这一关系，探讨了希尼对自己家乡、对土地、对自然、对空间的理解和建构，分析了历史和文化的负担对诗人的“地方感”的影响，并展示了希尼最终超越了对自己生活的地方的简单忠诚，在开放性的世界视野中去确立诗人的生存位置和活动处所的思想过程和艺术过程。第三个部分《测听语言》则着重剖析了“诗人和他的文学遗产”的关系。作为一个爱尔兰天主教农民的后裔，希尼承受着两种不同的语言和文学传统的交互影响，他的诗歌创作很大程度上是在不同的语言和文学传统中进行频繁的穿梭和转换。这个部分，试图去探讨这种语言和文化的“跨界”经验，对希尼的诗歌创作风格以及他的语言观念、文学观念的影响，以及他不断地寻求不同的语言和文学遗产能在诗歌中真正地平等交流和有机融合的努力。第四个部分《暴力的考古学》则剖析了“诗人与他的当代世界”的关系。希尼生活的当代世界最基本的特征是集体暴力支配生活，希尼通过对不同历史时期的人类集体暴力悲剧的深切的体察和严肃的思考，剖析了人类层出不穷的暴力选择背后深刻的文化根源和消极的文化影响，论证了希尼试图通过对个体生命价值和人类本能生存要求的肯定，来消除暴力的文化逻辑的后果的努力。在结论部分，试图在这些分析的基础上，总结出希尼诗歌的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以及希尼如何通过这些具有强烈感染力和普遍性的诗歌，揭示在人类的矛盾丛生的真实状态中，诗歌何以成立并依然能为人类应对这些复杂的社会文化矛盾，提供富有启示意义的智慧。

本书并不准备为诗歌和历史关系的古老问题，提供一个普遍有效的固定结论，只是希望通过对希尼诗歌创作和北爱尔兰社会文化矛盾的关系这个具体个案的初步考察，重新凸显这个古老问题的问题性，以帮助我们理解人类生存条件的变化，并没有使诗歌丧失其存在意义，因为诗歌的意义是牢牢地扎根于人类和世界的独特关系——也就是人类自身的历史之中的。